

上海书展·阅读的力量

“上海书展·阅读的力量”2020特别网聚三天来举办了200余场线上阅读活动

扩容线上书友圈，“云伴读”激活图书业新思考

■本报记者 许旸

全民抗“疫”的当下，沪上多家出版机构、书店、文化平台纷纷探索将“线上模式”作为主打，随着“上海书展·阅读的力量”2020特别网聚开展了三天后，“云上伴读”迎来集中爆发。据不完全统计，自22日晚启动以来“线上书展”举办了200余场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线上阅读活动，百余名作家、学者、音乐家、多行业知名人士等陆续汇聚“云端”，吸引了累计数百万人次观看、参与。

其中，最具特色的“悦读时刻”每晚8点至9点时段推出，网红“硬核医生”张文宏坐镇首场直播分享，聊复工谈防疫，金句连连，在几大平台“刷屏”，网友留言互动踊跃。随后两晚，乐评人田艺苗、儿童文学作家张弘分别围绕古典音乐、中外童书为市民阅读推荐书籍和亲子共读，影响广泛。

当B站、喜马拉雅、今日头条等大众网络平台和出版机构之间资源共享、流量对流，更密集灵活的网络连线打破了疫情期间人与人之间的物理阻隔，许多上海乃至全国的读者足不出户就能在线尽享高品质多品类的文化服务，缓解焦虑心态，在书香中共建温暖有力的精神家园。眼下，更多阅读文化资源、平台资源、媒体资源正不断加入，汇集起强大的阅读力量，聚合成卓越的上海城市品格。

满足大众求知刚需，线上读书会不止是“简单搬运”

“线上线下各有优势，线上读书会并不单纯是线下活动的代偿或是简单搬运，反而拓展了很多可能性，需要更适应网络、客户端传播的特性和规律。”这几天，不少出版社和实体店纷纷涉水在线讲座、直播互动，多位资深人士表示，相较线下作家学者与读者的面对面交流，线上不受场地空间限制，往往能聚集起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网友观众同时在线收听，并通过视频回放进一步释放书香效应。

眼下，大众对疫情引发的医学人文、城市建设、亲子共读等话题及相关读物尤其感兴趣，“上海书展·阅读的力量”2020特别网聚的活动中，不少线上读书会和公众号聚焦这一领域，从不同视角邀请学者予以解读，回应读者需求。比如，建投书局推出“星涌人文直播学堂”特别策划“知识战疫”系列课程首期讲座，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带来《疫情与城市——城市公共卫生危机延伸的思考》，针对“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是否与人口规模和密度有关？”“如何杜绝下一次传染病的来袭？”等热门话题展开分析，剖析了城市发展大趋势，获在线读者好评。“此前学堂线下活动受场地制约，参与人数约在100人至150人左右，这场线上直播一个半小时吸引了近1200名观众进入直播间，结束后还有观众陆续返回看，大大扩展了参与人数。”建投书局浦东店品牌经理陈佳佳说，除了在线互动，主办方还特别制作了包括《城市秩序》《规模》在内的主题书单，启发读者在讲座之外，获取可持续发展的阅读能量，提升“线上附加值”。

“疫情期间不能出门与朋友相聚的日子，小朋友难免有些孤单，就像海上孤单矗立的灯塔一般。但如果内心充实，也能成为像灯塔一样给周围人带去光芒的存在。”昨晚的“悦读时刻”在线上分享上，“魔法童书会”创办人张弘为“宅家”的父母和孩子送上亲子共读课，并邀请嘉宝和妈妈这对母女共读凯迪克金奖绘本《你好灯塔》，还有绘本作家袁晓峰讲解《小老鼠又上灯台喽》，“或许大人们忙于在家办公，忙于关注疫情新闻，忽略了孩子眼中的不安。不妨亲子共捧一本书，让阅读的力量照亮生活。”这正是张弘做这期活动的初心。

加速数字化转型，“云阅读”或成图书业新拐点？

当阅读和分享移到云端，共同怀抱阅读热情的同道在另一种媒介“相遇”。不少出版人纷纷表示，即便疫情结束，形式新颖多样的线上活动很有可能常态化，与线下推广共存，并将与网络平台联手，侧重推出电子版、有声版、视频版等网络版本，提高传播效率。

沪上多家出版机构纷纷借助“上海书展·阅读的力量”平台策划免费数字阅读资源、疫情专题课程、专家直播课等，满足读者的激增需求。比如复旦大学出版社《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说“不”》编者之一、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重症科主任王瑞兰在武汉前线为网友讲述疫情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开放“防疫助学频道”“抗疫图书网络版”等丰富资源和活动，推出“好奇心哥哥”系列网络直播科普讲座，让不少网友纷纷留言大呼过瘾。

“如何通过新媒体更广泛推广出版物的内容和品牌，推动传统出版加速数字化转型以适应新的教学需求和阅读习惯，甚至探索出版的盈利模式的创新？或许到了重新思考出版新内涵、知识服务逻辑的时候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李广良告诉记者，在新媒体营销、内容传播、内容策划尤其是深度用户运营方面，这次线上书展提出了新挑战。这几天，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把《谈医论症话健康》《醉是心从容：乙酰脱氢酶2基因》《运动与体重管理》等医疗健康类精品图书搬到了喜马拉雅和B站上，由一线医学大咖和作者本人录音、录像，同时上线有声书、视频书，但整体点击和话题度离“爆款”仍存在一定的距离。在加速数字化转型路上，“云阅读”或成图书业新拐点。

Book promotion section featuring '疫路心防'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抗疫期间中小学生及家长心理防护手册' (Mental Protection Manual for Children and Parents During the Epidemic), and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说“不”' (Saying 'No' to COVID-19). Includes book covers and promotional text.

费里尼老了，抑郁的青春却还没完没了



费里尼经典作品《骗子》(左图)、《卡比利亚之夜》(上图)剧照。

■本报记者 柳青

自上月起，从意大利传出的新闻多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有关，防疫压力之下，费里尼的冥诞纪念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如果不是柏林电影节经典回顾单元放映费里尼的《骗子》，除了铁杆影迷之外的多数人几乎要不得记得，今年1月20日是这位意大利导演的百年诞辰纪念。

作家卡尔维诺以好朋友的身份为费里尼写过一篇《观众回忆录》。在文章的开头，卡尔维诺对电影的界定是“一种逃避”“满足我对异乡的向往、将注意力放到另一个空间去”。但费里尼的电影是不同的，因为它们“提供的不再是距离，而是完全相反的感觉，所有的事物都在我们身边，攀附在我们身边”。一生只为那部，费里尼的全部创作是一部从未中断的自传，电影是他的回忆录。自《八部半》之后，他的创作轴心是对自我的解析，在那之前，以《甜蜜的生活》为界，在他仍愿面对外部世界时，他把来自个体的经验和对当时意大利的认知写成了关于人性堕落的神话——《骗子》恰好是个承前启后的枢纽，串联起他的这部分作品。

费里尼前期的作品中，《骗子》不是声誉最隆的一部，它完成于1955年，夹在《大路》和《卡比利亚之夜》中间。《大路》的成功让当时意大利的制片人追着费里尼，让他“再来一个杰索米娜”（《大路》里女小五的名字）。费里尼很谨慎地没有滥用女演员茱丽叶塔·玛西娜的魅力，在《骗子》中，茱丽叶塔仅是作为帮衬地露了几次脸。但是《骗子》拍摄过程中的一些花絮，促成了之

后的《卡比利亚之夜》，那成了茱丽叶塔演技封神之作。自然，意大利的制片人又追着费里尼要“更多的卡比利亚”，而他，用一部激起巨大争议的《甜蜜的生活》为他的前半生作了小结。

《骗子》处在两部“茱丽叶塔代表作”之间，其实论情节，它更接近于《浪荡儿》的延续，论精神气质，它是《甜蜜的生活》的铺陈和预演。游手好闲的小伙子老了，年龄已长，抑郁的青春却还没完没了。《骗子》的开场是一桩荒唐的骗局，三个骗子假扮成神职人员，用浮夸的演技唬住一户贫农，骗走了她们全部积蓄。而当这三人满载而归回到罗马，在声色犬马的浮华世界里，他们成了被藐视、被欺凌的蝼蚁。骗子们拙劣的把戏重复了一次又一次，形成一个让人绝望的戏剧闭环：在意大利的那个年代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骗子》的尾声带着强烈的道德训诫色彩，但这个阶段的费里尼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批判现实主义。虽然他把自己从《卖艺春秋》开始的几部作品形容成“电影笔记”，记载着“我从三等车厢的窗户或木偶戏舞台的侧幕所瞥见的城镇，那些隐蔽于山顶或在阴暗山谷中锁雾围绕的小乡村，吹沙走石的街道和老乡镇间流浪的小人物，他们的漂泊，他们的相遇，他们的一生。”而这笔记从来不是照相式的复制和再现。卡尔维诺敏锐地注意到费里尼进入电影行业前，他作为插图画手的经历对他一生创作的影响，“漫画家费里尼和电影工作者费里尼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即，漫画画报和战后意大利电影之间的关系。”《卖艺春秋》《大路》

里的游方艺人和《浪荡儿》《骗子》里的虚无青年，他们因为各不相同的原因成了那个时代的边缘人，而他们之间也是道不同的群体。费里尼电影画面的力量，根源是画报式图像的和谐，如卡尔维诺所总结的：平民化，罗马化，刻意为之的粗俗，近乎粗暴的笔触，排除任何令人宽慰的憧憬。

费里尼在晚年的回忆录里提到他返回故乡遭遇的夜生活：“三更半夜，人群川流不息，他们来自全世界。在霓虹灯照耀下，这些黄色、红色、绿色的脸来买染色的冰淇淋、西班牙运来的鱼、做得很难吃的披萨。人们从不睡觉，呐喊的歌曲和电吉他隆隆响了一整季。白天占据了夜晚而夜晚占据了白天，没有休息。像北极那样四个月漫长的白天。”这是罗马涅省里米尼小镇的夜晚，也是战后百废待兴的罗马城郊的夜晚，是奥古斯都（《骗子》）、卡比利亚和帕帕拉齐（《甜蜜的生活》）所遭遇的罗马之夜。费里尼制造的画面，是对时代体验的传达和人物内心氛围的安排，在他的这些“最初的电影笔记”里，浪荡青年的乡下和物欲流淌的罗马，是同一个世界，同样是地狱里的一层，也是幸福的安乐乡。

当被记者问到“罗马是什么”时，费里尼说他的心中只有碎片的景象——支离破碎的天空，歌剧舞台的背景和忧伤的颜色。这是费里尼在入梦以前看到并记录的世界：于色彩浓烈哀伤的天地之间，无足轻重的生命承受着穿插了无尽残忍和丑陋的命运，人们被内心的荒芜和不明的罪恶感支配着，一种集体的瘴气无可救药，是那个年代意大利的歌斯底里症。

名家访谈

城市与文学的相互造就，需要作家们更热切而敏感地投入

■嘉宾：杨扬（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  
■采访：汪荔诚（本报记者）

金宇澄的《繁花》、王安忆的《匿名》《长恨歌》……一座城市与它的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市文学，以一种文化标记，把一个城市的品格凸显和凝聚起来；同时，一座城市的人文建设，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作家的思考和创作，也有着绵绵不绝的浸润式影响。

“在今天的城市化进程中，不能单单将注意力集中在城市的生态指标、经济指标和环境指标等硬性指标上，还应该关注人文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没有安全、健康、优美的城市人文，这样的城市建设多多少少是有缺陷的。文学艺术在人文城市建设中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著名文艺评论家、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杨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文汇报：您是国内较早思考城市化与审美关联问题的学者，您曾经在《城市化进程和文学审美方式的变化》一文中提及，上海这座城市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创作影响深远。近百年来，风格多样的杂志、大大小小的出版物、各类文化艺术机构云集上海，孕育了很多文学人才。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城市对于作家创作有了哪些新的影响？您所关注的城市化与文学审美问题，有了哪些新的看法？

杨扬：我最初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慢慢涉及到当代文学问题。对于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一直有很多说法，我觉得最简洁的表述应该是上海的文学崛起。因为在中国文学史的漫漫长河中，上海一地几乎没有标识度，只有从近现代开始才成为关注的对象。而上海这一现代都市辐射之下的文学，有一种独特性，形成了城市与文学这样的研究课题。

杨扬：我最初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慢慢涉及到当代文学问题。对于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一直有很多说法，我觉得最简洁的表述应该是上海的文学崛起。因为在中国文学史的漫漫长河中，上海一地几乎没有标识度，只有从近现代开始才成为关注的对象。而上海这一现代都市辐射之下的文学，有一种独特性，形成了城市与文学这样的研究课题。

文汇报：您曾经指出，近20年来，“新成长起

来的作家大多是都市生活的产物”，城市对于作家创作产生的影响，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明显。那您认为，城市人文建设对于文学品格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杨扬：我们今天来谈城市文学，尤其是在一个疫情围困城市的严峻时刻，关注城市的人文建设，不是要转移严肃的话题，或风雅一番，实在是城市人文建设非常重要。现代城市，有人文与没人文，就像有灵魂与没灵魂的差异一样巨大。人文就相当于一种文化标记，能够把一个城市的品格凝聚和凸显出来，成为行事规则和价值行为的共同标准。这不是单靠拼经济就能解决的，需要有一种共同的社会认同基础。我们今天的城市化进程不是到了这一阶段，这是城市文化理念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强调城市文学对作家创作的塑造作用，但不要陷入城市主义的决定论陷阱中去。城市文化是多元化的，具有巨大的包容性。我们去虹口的景云里，看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冯雪峰等文化名人的故居，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这么多文化人会云集到上海来。这当然是上海的人文环境，能够容纳他们。上海的文化底蕴，至少在文学上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学人物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这是一种历史文脉，谈城市文化一定要关注这种文脉，这对于我们理解城市文化，包括城市文学，是有参考价值的。换言之，城市化进程不仅仅要推高经济指标，而且在文化、文学上，也需要有相匹配的创造力。

文汇报：随着城市的更新发展，城市作家在文学表达上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丰富阶段，对此，您觉得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呢？

杨扬：从理论上说，越来越多作家意识到不能复制和停留在原有的现代水平，应该有属于新世纪的变化和现实感。单从小说创作看，王安忆的《长恨歌》和金宇澄的《繁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其他像陈村、王康的《生发遗忘》、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唐颖的《阿飞女生》等，都是从各自的角度，表现着上海这座城市的生活。

谈城市文学一般都会注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其实，城市化过程覆盖整个中国，各地都有体现，作家的反应也是千姿百态的。有时候，文学给人以梦幻与想象，但有时文学也是破除梦幻的清醒剂。好的城市文学，让我们触及城市化进程中那些尖锐而敏感的东西，破除了一些人将城市化简单理解为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的物质生活梦境。城市化是一种历史过程，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就有这个阶段的问题和特征，尤其不能靠粉饰和虚幻来维持城市文学。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中国的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靠血缘和家族制度维持；而城市社会是陌生人的世界，靠社会契约和律法来规范。五湖四海的陌生人来到大都市寻求生存和发展，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这些天南地北不同文化背景的东西，如何在城市文学中得以呈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北京有过这样的体现，鲁迅、茅盾等都曾满怀热情地予以关注和评价，甚至强调所谓的乡土文学，也是离开故土、移居城市之后的某种乡愁记忆。相比之下，今天一些作家、批评家对城市文学的关切和热情程度，是有差距的。